



中国江南： 寻绎日本文化的源流

王勇 主编



当代中国出版社



王勇 主编

中国江南： 寻绎日本文化的源流

当代中国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中国江南：寻绎日本文化的源流/王勇主编. —北京：
当代中国出版社，1996. 11
ISBN 7-80092-510-2

I. 中… II. 王… III. ①国际文化关系-研究-中、日②
日本-文化史-研究 IV. K313.03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96) 第 15524 号

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发行

社址：北京地安门西大街旌勇里 8 号 邮政编码：100009

北京地质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850×1168 毫米 32 开 11.625 印张 2 插页 280 千字

1996 年 11 月第 1 版 1996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—2000 册

定价：19.80 元

目 录

绪 论 古代江南与日本的海上航路	王 勇(1)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---

甲编 原始时代至六朝时期

稻作的东传和江南之路	毛昭晰(21)
中国江南地区原始文化由海路输入日本论	王心喜(31)
古代日本的吴越移民王国	王 勇(49)
江南始祖与日本的“泰伯后裔”说	吕洪年(71)
慈溪达蓬山的徐福遗址	周乃复(87)

乙编 隋唐至宋元时期

浙东唐诗之路与日本平安朝汉诗	肖瑞峰(97)
吴越国文化与日本	屠承先(116)
入宋僧与杭州	〔日〕藤善真澄(131)
从比睿到天童看道元思想形成的另一条轨迹	杨洪鉴(142)

丙编 明清时期

浙江与日本:1684 至 1728 年宁波船的动向 ...	〔日〕大庭修(157)
宽政十二年远州滩漂流着唐船	〔日〕藏田贯(172)
王阳明与日本	牛建科(182)
陈元赞在日本的文化交流活动之轨迹	周如汉(195)
一百多年前一个日本人的上海手记	
——岸田吟香的《吴淞日记》	王宝平(207)

DK72/08

关于杭州府种痘科医生李仁山……………〔日〕宫下三郎(226)

丁编 近现代时期

曾根俊虎与冈千仞的杭州及浙江之行

- 交流与论争……………〔日〕小岛晋治(239)
- 阳明学与明治维新……………傅振熙(244)
- 清末民国初期浙江留日学生之动向……………〔日〕小岛淑男(254)
- 中国省份最早派遣的公费留日学生……………吕顺长(266)
- 郁达夫与日本文化及其他……………蒋增福(282)

戊编 江南地区与日本

中日两国地方志的比较研究

- 中国慈溪市与日本广岛市的地方志修纂……………陈桥驿(301)
- 江南雉仪与日本追雉……………马兴国(316)
- 江南歌谣与日本……………〔日〕大木康(331)
- 江南与中日戏剧文化交流……………宋延平(341)
- 日本冲绳民俗与中国闽浙民俗比较……………叶大兵(356)

——绪 论——

古代江南与日本的海上航路

王 勇

—

江南与日本之间，自古有一条海上通途，两地人来物往，促进了种族交往和文化交流。这段历史不仅可以证诸考古资料，在“泰伯后裔说”与“徐福东渡说”中亦有所折射。

倭人自称吴泰伯后裔，见诸 3 世纪成书的《魏略》，唐宋时代又为多种文献采录，兹举如下：

①《翰苑》残卷第 30 倭国条在“文身黥面，犹称太伯之苗”后注云：“《魏略》曰……其俗男子皆黥面文身，闻其旧语，自谓太伯之后。”

②杜佑《通典》边防典一·倭人传注云：“《魏略》云：倭人自谓太伯之后。”

③《太平御览》四夷部引《魏志》云：“其俗男子无大小，皆黥面文身，闻其旧语，自谓太伯之后。”

④《梁书》倭传云：“倭者，自云太伯之后，俗皆文身。”

⑤《北史》倭国传云：“俗皆文身，自云太伯之后。”

⑥《晋书》倭人传云：“男子无大小，悉黥面文身，自谓太伯之后。”

⑦《资治通鉴》记云：“今日本又云吴太伯之后，盖吴亡，其

支庶入海为倭。”

泰伯（太伯）即古公亶父长子，因让国于三弟季历，被孔子誉为“至德”。泰伯与二弟仲雍避至荆蛮，断发文身，教化土人，“归之者千余家”，于是立国号句吴^①。

据《资治通鉴》，公元前473年越王勾践灭吴，“其支庶入海为倭”，佐证中日之间已有海路相通。《太平御览》引《外国纪》云：“周详泛海，落综屿，上多纻，有三千余家，云是徐福童男之后，风俗似吴人。”秦汉之际，中国出现一次规模空前的民族迁徙浪潮，大批移民入海东求乐土，徐福东渡的遗址散布于东南沿海各处，说明在后世的传说中，徐福已经成为东渡华人的泛称。

晋人陆云《陆士龙集》载：“始皇南巡，登稽岳，刻文于石，身在鄞县三十余日。”《方輿胜揽》引《十道四蕃志》说，鄞山“以海人持货贸易于此，故以名山”。据《乾道四明图经》、《太平寰宇记》、《宝庆四明志》等，徐福率童男女从今宁波一带入海求仙，可与《太平御览》“风俗似吴人”的记载互证。

《翰苑》引《魏略》逸文，说倭人风俗“男子皆黥面文身，闻其旧语，自谓太伯之后”，又云：“昔夏后少康之子，封于会稽，断发文身，以避蛟龙之害。今倭人亦文身，以厌水害也。”倭人自称吴人后裔，风俗则似越人，这是因为吴越本就同源，语言、风俗殆无差异。如《吴越春秋》说：“吴与越，同音共律，上合星宿，下共一理。”《吕氏春秋》云：“吴之与越也，接土邻境壤，交通属，习俗同，语言通。”

在秦始皇统一中国的过程中，聚居江南的越人流散避乱，《越绝书》有“内越”、“外越”的名称，“外越”亦作“东海外越”，或指入海东迁的一支。

^① 参见《史记》吴世家。

吴越人迁居之地，并不限于一处，史籍中出现的综屿、东鯤、夷洲、澶洲（亦作“亶洲”）等，似乎都有吴越移民居住，所以与故地江南保持人来物往。《后汉书》在“倭传”之后有如下一段记载：

会稽海外有东鯤人，分为二十余国。又有夷洲及澶洲。传言秦始皇遣方士徐福将童男女数千入海，求蓬莱神仙不得，徐福畏诛不敢还，遂止此洲，世世相承，有数万家，人民时至会稽市。会稽、东冶县人，有入海行，遭风流移至澶洲者。所在绝远，不可往来。

徐福子孙“时至会稽市”，能够进行贸易，至少语言相通；又“会稽、东冶县人”时有漂著彼地者，说明这条通道自然天成。《三国志·吴书》孙权传，在黄龙二年（公元230年）的记事中说：

二年春正月……遣将军卫温、诸葛直将甲士万人，浮海求夷洲及亶洲。亶洲在海中，长老传言，秦始皇遣方士徐福将童男女数千入海，求蓬莱神山及仙药，止此洲不还。世相承，有数万家，其上人民时有至会稽货布。会稽、东县人海行，亦有遭风流移至亶洲者。所在绝远，卒不可得至，但得夷洲数千人还。

徐福的后裔来会稽是为“货布”，这是非常重要的线索，使我们想起《太平御览》所引《外国纪》的传闻：“周详泛海，落综屿，上多纻……风俗似吴人。”中国史书记述倭国情况，言道里必在会稽之东，论习俗必近吴越之民，举物产必有布帛之属。如《后汉书》云：“土宜禾稻、麻纻、蚕桑，知织绩，为缣布。”《三国志》云：“种禾稻、纻麻、蚕桑、缉绩，出细纻、缣绵。”产纻的综屿、货布的亶洲，或许是指日本某地。松下见林著《异称日本传》，认为“综屿……疑今八丈岛”，白鸟库吉、原田淑人等则将亶洲比定为种子岛，虽然均无确凿的证据，但思路大致是正确的。

三国时代，倭国女王多次遣使入魏，贡品中必含布帛之类，即景初二年（公元238年）贡“斑布二匹二丈”，正始四年（公元243年）献“倭锦、绛青缣、绵衣、帛布”，正始八年（公元247年）贡“异文杂锦二十匹”^①，以布类作为贡品，可以说是“货布”贸易的延伸，而日本的纺织技术，从下面将要列举的吴地织工渡日的实例推测，很可能是由东徙的吴越先民传过去的^②。

综上所述，从春秋末期至秦汉之际，江南一带的吴人和越人已开越海东徙的先风，他们乘坐足堪航海的舟楫^③，借助季风或暖流（黑潮），漂抵日本九州一带的概率颇大。吴越先民的陆续东渡定居，造成海洋两岸习俗相近，倭人自称吴族支裔。

安志敏在《江南文化和古代的日本》^④一文中指出，在古代通往日本的诸多海途中，由中国东海岸直达九州的“东海通道应是文化交流的重要路线之一”，并从考古学角度，论证“日本的稻作农耕、干栏式建筑、玦状耳饰、漆器、鬲形陶器和印纹陶以及环壕聚落、坟丘墓的出现，都和中国江南文化有密切的联系。”

在这条东海通道上，既有中国人乘桴而去，亦有日本人驾舟而来。关于汉魏之际倭人越海而来的事例，除上引《后汉书》、《三国志》的记载之外，考古学的发现为我们提供了新的证据。1974年，在发掘安徽省亳县的汉代古墓群时，从元宝坑村一号墓中出

① 倭国朝贡的年次：景初二年、正始四年，据《三国志》；正始八年据《册府元龟》。

② 生田滋甚至推断，倭国向魏进贡的纺织品，是通过狗奴国从江南进口的物品。（大林太良编：《跨越海洋的交流》，《日本的古代》第3卷、中央公论社1986年版，第101页）。

③ 春秋时代，吴越的造船技术已相当发达。据《越绝书》，越国在杭州湾岸就有“船官”（造船基地）数处，勾践曾出战船300艘进击山东的琅邪。当时吴国的军船，有大翼、中翼、小翼、突昌、楼船、柶船6种。

④ 载《考古》1990年第4期。

土字砖约 160 块,其中一块刻有“建宁三年(公元 170 年)四月”的年号,参与发掘的李燦根据《水经注》的相关记载,确定墓主是曾任会稽太守的曹胤。引人注目的是,有块字砖刻有“有倭人以时盟不”七个字,暗示《后汉书》所言“倭国大乱,更相攻伐”的桓帝与灵帝之间(公元 147~188 年),曾有倭人集团避乱来到会稽一带^①。

二

汉魏时代,中日之间的交通实际上有两条途径:一条是中介朝鲜半岛的官方通道;一条是利用海流的民间通道。《汉书》、《后汉书》、《三国志》所载的倭国使者,大抵先至半岛的乐浪郡或带方郡,然后从陆路赴洛阳朝贡;魏使梯儂、张政等大概也循此路赴倭报聘。

与此同时,江南与日本的民间通道,历史比前者更为久远,来往也较陆路更为频繁。尤其是会稽与九州一带的岛屿,不仅时有人员往还,甚至建立了某种规模的贸易关系。遗憾的是,有关这条海上通道,史书只留下零星的记载,具体的航线无法复原。

公元 265 年魏亡晋兴,据《晋书·武帝纪》,泰始二年(公元 266 年)“倭人来献方物”,这是隋以前日本经陆路与北方朝廷通交的最后一例,在其后倭王开始向南方诸朝遣使的约 150 年间,中日之间的政府往来处于停滞状态。

晋建兴四年(公元 316 年),北方民族逐鹿中原,晋室势衰南迁,中国进入南北分裂时代。在北方,先由北魏统一,后北魏分裂为东魏与西魏,北齐代东魏,北周代西魏,又灭了北齐,重新

^① 参见森浩一的《曹氏墓出土的倭人字砖及二、三问题》,《文化学年报》33 期。

统一了北方；在南方，东晋、宋、齐、梁、陈先后更替。

东晋义熙九年（公元413年），“高句丽、倭国及西南夷铜头大师并献方物”（《晋书·安帝纪》），是为中国史籍所见日本与南方朝廷通交之始。撷拾《宋书》、《南齐书》、《梁书》等记载，倭王赞、珍（一作“弥”）、济、兴、武（习称“倭五王”），在近百年间向南朝遣使约十次。

三国时代的吴以及东晋、刘宋、南齐、萧梁、陈朝，因为均建都在长江下游的建业（后改称“建康”，即今南京），故史书合称之为“六朝”。日本则沿用三国时的旧称，将六朝统称为“吴”。

从5世纪初开始，日本向吴地的建业遣使，改变了汉魏时期的传统贡道，走的应该是自古有之的海路。然而，事情并非如此简单。《日本书纪》应神三十七年（公元237年）^①二月条载：

遣阿知使主、都加使主于吴，令求缝工女。爰阿知使主等，渡高丽国，欲达于吴。则至高丽，更不知道路，乞知道者于高丽。高丽王乃副久礼波、久礼志二人为导者，由是得通吴。

这是日本史籍中最早的使吴记事，其时应神天皇的使者尚不熟悉路径，最初走的似乎还是传统的贡道，后在高丽（或指百济）向导的带领下，辗转抵达吴地。大概是陆路绕行的缘故，途中颇费周折，往返竟用了4年时间，到应神四十一年（公元241年，推定为公元403年）二月才回到日本。

在中国处于南北分裂的状况下，通过大片北方的敌对地区向南方朝廷进贡，不仅费时耗力，在外交上也要冒巨大的风险。在这种国际背景下，日本的贡道由陆路改为海路，是势所必然的。

^① 《日本书纪》的纪年不太可靠，按那珂通世的推算，神功、应神两代比实际纪年提前了约162年，即应神三十七年约当公元399年。

《文献通考》三百二十四谈到倭人来华路线时云：

初通中国也，实自辽东而来……至六朝及宋，则多从南道浮海入贡，及通互市之类，而不自北方，则以辽东非中国土地故也。

马端临（公元1254—1323年）断言日本“从南道浮海入贡”始于六朝，海路虽然自然风险远较陆路为大，但是大大缩短了行程，同时也可避免政治外交上的纠纷。从日本方面的史料看，雄略天皇时身狭村主青两度奉使南朝，往返均用两年时间左右，比应神天皇时的陆路绕行，节省了大约一半时间。这两次出使记事，均见《日本书纪》，兹录如下：

①雄略八年（公元464年）二月条：“遣身狭村主青、桧隈民使博德使于吴国。”

②雄略十年（公元466年）九月条：“身狭村主青等，将吴所献二鹅，到于筑紫。”

③雄略十二年（公元468年）四月条：“身狭村主青与桧隈民使博德，出使于吴。”

④雄略十四年（公元470年）正月条：“身狭村主青等，共吴国使，将吴所献手末才伎、汉织、吴织及衣缝兄媛、弟媛等，泊于住吉津。”

据《新撰姓氏录》“左京诸蕃上”载，身狭村主一族“出自吴孙权男高”，即其先祖是孙权的长子孙登（子高）。从身狭村主青的汉式单名“青”字判断，他大概是尚未倭化的早期移民，熟悉故地江南的情况，选择“从南道浮海入贡”的可能性较大。

雄略十四年（公元470年），身狭村主青是偕“吴国使”归国的，此外《日本书纪》仁德五十八年（公元370年）、雄略六年（公元462年）均有“吴国朝贡”、“吴国遣使贡献”的记载，吴人越海东渡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，必定积累了丰富的航海经验，不

会舍近求远另择他途。

那么,《文献通考》所说的“南道”,究竟是怎样一条路线呢?身狭村主青偕“吴国使”泊于难渡(今大阪)的住吉津,这是中日海途的东端。倭五王的使者大概多从难波起帆,过濑户内海至筑紫,再经对马至百济,然后横渡黄海,南下达长江口。在这条交通道上,百济是一个重要的中转站,这样可以循着海岸航行,比从九州渡东海直达江南要安全得多。下面我们对这条中经百济的海上之路,作一些文献上的考证。

刘宋开明二年(公元478年),倭王武(比定为雄略天皇)遣使上表,这份文辞雅丽、气势恢宏的表文,其中有如下一段:

臣虽下愚,忝胤先绪,驱率所统,归崇天极,道遥百济,装治船舫。而句骊无道,图欲见吞,掠抄边隶,虔刘不已,每致稽滞,以失良风。虽曰进路,或通或不。(《宋书》)

“道遥百济”一句,《南史》作“道径百济”,“遥”或当“繇”解,《新唐书·日本传》曰:“天宝十二载,朝衡复入朝……新罗梗海道,更繇明、越州朝贡。”可为互证。倭王武的上表文,诸家解释多有分歧,笔者是这样理解的:倭王“装治船舫”,欲经百济来华朝贡,因高句丽“图欲见吞”,贡路受阻不通,致使贡船“稽滞”难发,有失列祖慕华“良风”。倭王武以此为藉口,欲大兴兵甲,打开“壅塞”的“天路”,意在获得宋朝更高的封号。

日本转道百济入华,一方面因为两国结有同盟,另一方面百济与南朝交往密迹也是原因之一。《日本书纪》雄略十一年(公元467年)七月条云:“有从百济国逃化来者,自称名曰贵信,又称贵信为吴国人也。”知吴人赴日亦经由百济,或者说百济本多吴人杂居。又据同书推古二十年(公元612年)记事,百济人味摩之,曾在吴地学得伎乐舞,到日本后传教给少年,表明百济的文化与江南有很深的渊源。

日本的儒学与佛教最初均传自百济，而百济的文化又与南朝一脉相承，这种文化的传播路线，也佐证了在江南与日本之间，存在着一条中经百济的往来通道。

三

6世纪末，随着中国的南北统一，日本以圣德太子为中心推行一系列重大的国政改革。对外，恢复与中国中断百余年的国交，多次派出遣隋使及大批留学生（僧），吸收大陆文化的途径由间接变为直接；对内，7世纪初先后颁布《冠位十二阶》和《宪法十七条》等，试图以儒教为道德规范、佛教为国家精神，建立起以天皇为君主的封建中央集权。

据《隋书·倭国传》，开皇二十年（公元600年）倭王“遣使诣阙”；大业三年（公元607年）倭王又“遣使朝贡”。从《日本书记》可知，此次遣隋使由小野妹子出任。大业四年（公元608年）四月，小野妹子偕同裴世清等隋使13人抵达筑紫，再经濑户内海至难波，同年八月始得入京呈书。

隋代中日使臣的往来，似乎依然循着六朝时代的旧途。关于裴世清的赴日路线，《隋书·倭国传》载云：“上遣文林郎裴清^①使于倭国。度百济，行至竹岛，南望舂罗国，经都斯麻国，迥在大海中。又东至一支国，又至竹斯国，又东至秦王国，其人同于华夏，以为夷洲，疑不能明也。”

裴世清一行先经百济，再过对马（都斯麻）至筑紫（竹斯），所经秦王国究竟在何处，虽有严岛、周防诸说，但目前尚未形成定论，推断这是一个大陆移民聚居的地区。

① 裴清，即裴世清。《隋书》撰者因避唐太宗李世民讳而略之。

前面已经述及，在六朝时期的中日海上交通中，位居朝鲜半岛西南端的百济，始终是举足轻重的中继要津，这种情况到了隋代亦无太大的变化。《隋书》载：“（大业四年）三月壬戌，百济、倭、赤土、加罗国并遣使贡方物。”百济与倭同年入贡，恐怕不会是偶然的巧合，日本在中断百余年后与中国重开通交，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另辟新途，循例先至百济，由百济遣使充当入华向导，这大概就是上述《隋书》记事的外文之意了。

大业四年（公元608年）诣京“贡方物”的日本遣隋使，《日本书纪》载明是前一年出发的小野妹子一行，所献国书因言辞不逊，炀帝“览之不悦”，事见《隋书·倭国传》。小野妹子回国时，隋帝遣裴世清同行，途中亦经百济，说明隋初的中日交往，百济实有斡旋之功。朝鲜史书《三国史记》云：

百济三十世武王九年（公元608年）春三月，遣使入隋朝贡，隋文林郎裴清奉使倭国，经我国南路。

这里所说的“南路”，当指百济经对马至日本九州的海路。那么，百济偕倭使入华，走的是哪一条航线呢？《日本书纪》推古十七年（公元609年）四月条，有一则重要记事可资参考：

筑紫大宰奏上言，百济僧道欣、惠弥为首一十人，俗七十五人，泊于肥后国苇北津。是时，遣难波吉士德摩吕、船史龙，以问之曰：“何来也？”对曰：“百济王命以遣于吴国，其国有乱不得入，更返于本乡，忽逢暴风飘荡海中，然有大幸而泊于圣帝之边境，以欢喜。”

日本习称建都南方的六朝为“吴”，但是陈朝已在此前的开皇十一年（公元589年）灭亡，南方独立的朝廷不复存在，加之隋灭陈统一南北后，百济即与之建立朝贡关系（如据前引《三国史记》，公元608年曾遣使入隋），不可能再有子虚乌有的“吴国”朝贡。那么，这则记事该怎么解释呢？笔者以为，道欣一行僧俗85

人既然是奉百济王之命出使，当属政府使节无疑；因为前一年百济已向隋朝遣使，对中国南北统一的情况应该了如指掌，所以“遣于吴国”云云，暗示百济使团的登岸地点在江南一带。

还有一个问题，道欣自云“其国有乱不得入”，似与史实不符，当如何解释？随着中国政治中心的转移，沿海港口的职能或地位也会发生变化。隋朝统一中国后，东亚的政治格局为之改观，原来与南朝通聘的周边国家，被重新组合到隋帝国的朝贡体系之中，面向东方诸国开放的港口，自然从江南移向华北。当然，通交港口在空间上的转移并非一蹴而成，外国来贡航线的更改也需要一个时间过程，于是在这种空间和时间的转换、推移之间，容易出现某种错位，百济使欲从江南登岸而未被许可的可能性不能排除。

从《日本书纪》可知，百济虽然向隋帝朝贡，但走的却是传统的南方贡道。江南一旦纳入隋朝版图，作为南朝对外港口的机能便逐渐失去，地方官员以此理由却回百济使者，并非是毫无可能的了。有一个历史事件或许能为上述推测提供一些佐证，9世纪初日本派出第十八次遣唐使，空海搭乘的使船遇风飘至福州，而当时江南的明州、扬州才是政府公认的遣唐使登岸之地，福州地方官员因此试图却回日本使节。

以上对609年道欣一行出使“吴国”而未果使命的原因作了一些分析，倘若上述推测能够成立的话，那么可以推知608年的百济使者也是循传统的南路向隋朝进贡的。进而言之，日本的遣隋使既是中介百济入华，走的也应该是同一条贡道。早期遣隋使由江南入贡，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加以印证。

首先，小野妹子于推古十五年（公元607年）七月从日本出发，次年三月才抵达隋都，而同年四月已经偕隋使回到日本。往途用了8个月，归途仅用了1个月，这说明小野妹子一行是绕道

入华的，即先经百济至江南，然后走陆路北上隋都；而裴世清一行则从登州一带入海，与遣隋使一起经百济抵达九州。

其次，小野妹子所携国书有“日出处天子致书日没处天子无恙”一句，隋帝览之不悦，谓鸿胪卿曰：“蛮夷书有无礼者，勿复以闻。”（《隋书·倭国传》）日本称六朝为“吴”，日语读若“kure”，意即“日没”，含指西方。这说明圣德太子依然将隋帝视为“吴”的一个君王，其外交观念尚未摆脱倭五王朝贡南朝的陈规，那么所取的贡道也只能是因循旧例。

再则，传说小野妹子入华以后，曾赴湖南的南岳衡山购求佛经，其活动区域均在长江以南，这也暗示遣隋使的登陆地点在江南，而不是在华北一带。

综上所述，从倭五王朝贡南朝开始，中日之间的海上通道在很大程度上依靠百济的中介，而百济与江南关系密迩，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隋代，如据《日本书纪》所载，推古二十年（公元612年）百济人味摩之来到日本，他曾在吴地习得伎乐舞（一作“吴乐”），将之传给真野首弟子和新汉济文两位少年；同年，另一位百济人芝耆摩吕（一名“路子工”）也移居日本，在天皇宫中建造了须弥山和吴桥，其技艺亦似传自江南。

圣德太子的对隋外交，一方面因袭倭五王的传统，一方面依赖百济的斡旋，从东亚的政治格局发生剧烈变化的背景观之，可以说最初的遣使经历了失败的教训，隋煬帝斥其国书无礼即为明证，从江南入贡亦属败策。但是，自裴世清使日之后，日本增加了对华了解，隋使回国时小野妹子再度随同入华，所行航线大概与来时相同，以后的遣使及早期遣唐使也循这条经百济至登州的航线，我们一般称之为北路，以区别于经百济至江南的南路。